

讀者參考叢書

READER'S REFERENCE DIGEST

兩代風流

不求財富,但求出人头地
关于'96房地产市道的对话
预测二十一世纪个人趋势
飞船两小时后即将坠毁……

14

1997年4月出版

目 录

-
- | | | | |
|----|--------------------------------------|----|----------------------------|
| 4 | 从“内部人控制”到“代理人危机”
——从于志安“携款出逃”事件说起 | 51 | 当代教皇秘史 |
| 10 | 外汇储备猛增的反思 | 55 | 巴金与肖珊的一世之恋 |
| 13 | 中国离开人口承载极限还有多少年? | 57 | 叶利钦夫人趣话家事 |
| | | 59 | 爱情是会变化的,但要守住
——近访苏童 |
| 15 | 今后 20 年的中美关系及其影响 | 61 | 侯赛因国王的爱情奇遇 |
| 17 | “纳粹黄金”之谜 | 50 | 令人心动的情书 |
| 31 | 别出心裁的“智力投资” | 58 | 专家戏说爱情 |
| 21 | 跨国公司登陆中国 | 63 | 版权贸易在中国 |
| 24 | 富人还能富多久? | 69 | 电影与广告
——关于中国电影经济问题的一项建议 |
| 29 | 走进大学校园的中国第一代独生子女 | 73 | 格莱美的喝彩
——西方乐坛的“奥斯卡”奖 |
| 32 | 两代风流
——记新当选的香港特区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 | 74 | 日本卡通攻陷全球 |
| 36 | 影人访谈:姜文、陈道明、巩俐、潘虹、宋佳 | 75 | 关于'96 房地产市道的对话 |
| 42 | 将门儿女在哈军大 | 78 | 当铺中的大千世界 |
| 44 | 胡适和他的儿子胡思杜 | 80 | 电脑、住房、私车
——中国人的“超级三大件” |
| 47 | 美国第一位华裔州长骆家辉 | 81 | 别让名牌牵着鼻子 |
| 49 | 不求财富但求出人头地
——世界首富盖茨答读者问 | 82 | 中外名画拍卖最新排行榜 |
| | | 83 | 从世界竞争力1996年排行榜看中国竞争力 |
| | | 85 | 中国正积极发展核电 |
-

-
- | | |
|------------------------|-------------------------|
| 12 中国又找到五个大天然气带 | 103 名牌企业的“滑铁卢” |
| 86 我国特困企业占国有企业15% | 104 预测 21 世纪个人趋势 |
| 86 注重素质,不可“痴肥” | 105 你是容易失业的人吗? |
| 87 农民就业政府无法包办 | 107 克宫主人的另一面 |
| 20 中国农民不是 9 亿,而是 2.5 亿 | 110 飞船两小时后即将坠毁
..... |
| 9 我国将实行养老金社会化发放 | 112 名人讲课风采 |
| 87 1997年起实施新医疗保险制度 | 113 咖啡与名人 |
| 87 住房公积金管理措施出台 | 114 “扬州出美人”的历史真相 |
| 88 中国交响乐团没“皇粮”吃 | 115 青年踏入社会前的净言 |
| 88 新机制引入演艺界:出品人买断出品权 | 118 大学“神童班”为何大起大落? |
| 89 中国进入世界十大旅游国行列 | 119 爷们的足球 |
| 90 无师自通的小动物 | 120 聂卫平分析世界棋坛大势 |
| 91 大兴安岭东北虎已灭绝 | 121 塞纳死因扑朔迷离 |
| 92 日本巧用“天落水” | 122 香港的勋衔 |
| 93 揭开黑洞的秘密 | 123 澳门成了台湾黑帮避难所 |
| 95 '96 世界科学十大成就 | 124 姜昆笑侃宝岛行 |
| 96 造福人类的激光医学 | 132 澳大利亚掀起亚洲移民问题的争论 |
| 99 “生物圈 2 号”实验失败 | 133 三访海参崴 |
| 99 岁月抹不掉敦煌壁画:计算机保护获得成功 | 136 今日美国性奴隶 |
| 100 你喜欢耐克吗? | 137 最后的净土 |
-

——访新西兰游记		153	插花保鲜五法
41	话说当今法国女人	153	书籍除污妙招
144	哲学·时装·咖啡屋	154	钢琴的保养
146	外国人的休闲日	154	联合国邮票
147	女人各期的饮食原则	155	英国为什么现在仍册封贵族?
148	阿司匹林和雌激素有助于抑制老年痴呆症	156	资料室:
149	男人更需保护大脑		世界贸易组织
149	看病时,别忘记“自我保护”		亚太经合组织
150	睡眠与智力发展有密切关系		联合国粮农组织
151	购房请认“五证”		欧洲联盟
151	家庭电脑怎么配置好?		北约东扩
152	微机真能口说笔书都成文吗?		独立国家联合体
152	老式彩电可放 VCD	159	地震探源
152	光碟的维护和保存	封面图片	香港特区首任行政长官 董建华(原载《新现代画报》)
		封底图片	香港的艺术品拍卖(原载《良友》)

从“内部人控制”到 “代理人危机”

从于志安“携款出逃”事件说起

□郭笑文

一个从国外回来的朋友讲了这样一个并不可笑的“笑话”：一个停车场有100个车位，若是德国人，100个车位必定停100辆车；若是美国人，顶多停上80辆；而日本人呢，则会见缝插针停上120辆。那么中国人将如何行事呢？回答是，只停两辆，进口处一辆，出口处一辆！

对于德国人、美国人、日本人的行为，观其社会环境和民族性格，做出这种“行为预测”是很好理解的，而外国人对中国人的这种“行为预测”则值得国人思考。

在人们的行为背后，可以看到许多有形的和无形的东西。社会环境、制度环境、经济环境，是有形的，可测量的，思想文化、价值观念、伦理道德，是无形的，难以把握和测量的。

“携款潜逃”事件的背后

1995年中国企业界一件引起轰动的事，是长江动力机械厂厂长于志安“出逃”事件。这件事在新闻媒体曝光后，一时沸沸扬扬。一个全

国劳动模范，著名改革家，读过两个学位，有着系统的管理理念，每到企业都能妙手回春，曾被认为是最具企业家素质的人，他出逃的原因是什么？

一般认为是两个原因，一个是他私欲膨胀，抗不住金钱的诱惑而堕落；二是目前这种国有资产委托管理的制度，赋予企业法人代表以太大的权力，同时却没有相应的监督机制，以致他将国有资产转移而无人发现和阻止。前者是道德因素，后者无疑是重要的环境因素。但是这两者是否能够完全解释于志安“出逃”的原因呢？

有人就写文章为于志安抱不平。署名沈泓的人在《海上文坛》1996年第4期发表了《企业家于志安“出逃”启示录》，文章认为，于志安出逃是他产权理论的行为顺延。于志安很早就认为，国有企业应在承包经营中以企业留利的形式形成企业自有产权，然后与国有产权一起形成股份。文章指出，如果他的产权理论变成现实，也就不会有所

谓“出逃”，因为他将一个亏损200多万元的企业发展成为赢利逾亿的企业，他的企业自有产权早已超过国有产权了，他拥有无可争辩的控股权。菲律宾的公司本来就是他自己经营、自负盈亏的经营行为，岂有他哉？

显然，文章的作者和于志安本人对产权理论的理解有误，产权并不等于所有权，产权是指有关资产运用的权利，不是指对资产的所有权。企业法人财产包括出资者投资形成的财产和企业的经营过程中盈利形成的财产，并非指拥有独立于出资者之外的企业财产的所有权，更不能把法人财产理解为法人代表董事长或总经理的个人财产。

长江动力集团在菲律宾注册的公司，其法人代表是于志安，作为国有资产的代理人，对这个公司，他可以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公司的注册资本，可能是于志安任经理期间赢利形成的法人财产，但其终极所有权属于国家，并非于志安的私人财产。于志安出逃菲律宾后，武汉市政府立即派人到菲律宾交涉，试图追回国有资产，但于志安已抢先一步将在菲律宾注册的电力子公司的股权卖给当地的菲律宾人，将国有资产合法地转为私有财产。于志安不愧是拥有两个学位的专家，侵吞国有资产的手段也比常人技高一筹。

于志安的“化公为私”的行为并不是个别现象，据国有资产管理局

提供的数据，到1995年底，国有资产管理局共收到资产流失申报材料152件，其中流失亿元以上的有8件，千万元以上的21件，而这些犯罪活动有不少是经理人员监守自盗。至于以公款消费、滥发奖金、多摊成本、虚赢实亏等方式流失掉的国有资产则更是难以计数。有关专家在几年前就估算，中国以各种形式流失的国有资产每天达1—3个亿！

这种被称为“非正式私有化”的现象，如此普遍和严重，仅仅用道德原因或对“企业法人财产权”的误解是难以解释清楚的。

上述“化公为私”的行为，“卷款潜逃”的行为，是转轨时期社会环境、企业制度环境的产物。仅仅靠道德批判，靠精神文明建设，是难以杜绝上述行为的。要通过改变环境的办法，使绝大多数人们做出社会所期望的行为。

转轨期的尴尬

中国的企业改革走的是一条“放权让利”的渐进式道路，在原来的政府机构没有发生根本变化的情况下，通过放权让利和各种形式的承包制，把权力逐步下放给企业。国有企业已经获得了自身独立的经济利益和相当程度的经营自主权，有些企业已成为“无主管企业”，厂长、经理的权力不受制约，或者说，由于转轨时期的特殊环境加大了监督的信息成本，使外部人对内部难

以制约。从而出现了所谓“内部人控制”的问题，即指由于企业外部人（如所有者，包括银行在内的债权人等）监督不力，企业的内部人（如厂长、经理和工人）实际上掌握了企业的控制权。

例如，于志安为什么能把在菲律宾子公司的50万美元国有资产变成自己名下的私有资产？为什么迄今谁也拿不出他犯罪的证据呢？从长江动力集团的情况看，是中国企业内部人控制的典型。于志安独揽长江动力集团董事长、总经理、党委书记于一身，同时他还是政府授权经营的受托人，可以说集所有权、经营权于一身，可以任意动用公司的资产而又拒绝纳税检查，可以独自对外签合同不受任何监督，当他出逃菲律宾之后，人们才发现，号称年盈利逾亿元的长动集团，实际上已负债800万，集团内的200多家企业绝大多数是亏损的。

中国的国有企业目前的治理结构基本上是行政干预下的“内部人控制”。企业的实际控制者最希望的是把企业办成“无上级企业”。已改组为股份公司的企业，由于公司制度的不规范，普遍地希望实行总经理负责制，不想有什么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制约和监督自己，认为制衡关系影响效率，主张董事长、总经理一人兼。据统计，国家百户股份制试点企业，已基本完成改制的企业中，董事长兼总经理的有37家，董事长兼党委书记的26

家，三职一人兼的有18家。此外，由于“国有股”的代表是一些官员，企业内部人可以很容易地以低廉价格收买这些人，双方达成默契。于是，进一步巩固了内部人控制。

虽然在一定的条件下，内部人控制有可能改善企业的经济效益，但一般来说，内部人控制是不利于经济健康发展的。由于内部人追求的是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不是出资者利益的最大化，追求短期利益，而不是长期利益，从而可能导致资源配置的扭曲。它不仅损害出资者利益，而且也损害社会福利。

另一方面，实际上掌握着控制权的厂长经理们，因为人事控制权还掌握在上级部门的手中，自然无法形成长期行为。对于那些没有很强道德约束力的人，他的权力越大，牟利的机会越大，不安全感也越强，也就会想方设法加快速度把国有资产转为自己的私产，同时，为自己的退休、离职安排后路。于志安出逃的一个直接原因是他即将到退休年龄，安徽蚌埠卷烟厂厂长兼党委书记李邦福携款出境案发厦门，也是由于快到退休年龄。有人把这类现象称为“59岁现象”。站在这些人的立场上看，与私人业主相比，在职时的差别不大，可以享受在位的各项好处和用公款进行各种个人消费，有时出手比私人老板还大方；但是，一旦退休或失去手中的权力，就只能两手空空。私人老板辛辛苦苦干，最后都是自己的。

而国企的厂长经理辛辛苦苦干，最后都是公家的。国有企业的厂长经理普遍感到心理不平衡，于是，出现了所谓“代理人危机”。

中国公有企业“代理人危机”的产生，是转轨期特殊的社会、制度环境造成的。改革开放以来，私有企业和“三资企业”迅速发展，私人业主和三资企业高级管理人员的收入迅速增加，造成充当公有企业代理人的机会成本大大提高，公有企业目前的处境无法对大大提高的机会成本予以补偿，这使公有企业代理人感到一种潜在损失。为平衡这种损失，有些人通过各种方式转移国有资产，有些人则另谋高就，一走了之。对未来经济制度的预期，加大了“代理人危机”。无论是理论界还是企业界，都预期国有制经济在未来的经济格局中，其所占比重还会下降，一些公有企业的代理人感到前途未卜，事业成就感下降，更多地考虑未来的个人定位，从而必然地影响到当前的经营行为。

“代理人危机”的产生还与近年来新组建的公有企业，或者扭亏为盈的企业中经营者的创业史有关。特别是“拨改贷”以来，许多企业在法律上的上级主管单位没有任何资金投入的情况下，完全依靠贷款以及经营代理人的能力和广泛的社会关系，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发展起来。经营者的能力和他们的社会资源，巩固了其在企业中的权力和地位，许多创业经营者具有不可替代

性，他们的所有者意识和所有权要求的产生是自然的。

于志安的产权理论，实际上是他所有权要求的表现，并非对经济学体系中产权理论的误解。这种所有权要求，代表了相当一部分创业经营者的心声，而他们未来地位的不确定性又加大了“代理人危机”，使一部分经营者提出所有权要求。

一方面是代理人权力的扩大和对其约束和控制的弱化而产生的“内部人控制”，另一方面是原体制人事制度控制及其他社会原因产生的“代理人危机”，这就是转轨期企业治理结构和组织行为的尴尬。这种既矛盾又相关的行为，不仅造成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而且极大地影响公有制企业的运行绩效。

理性人 约束条件 市场环境

经济学最基本的假设是“理性人”假设，即假设人是个体理性的，其行为特点是在约束条件下追求个人效用的最大化，个人所面对的约束条件就决定了他们的行为。企业制度，本质上是对企业人的约束条件。在“内部人控制”与“代理人危机”条件下，企业人的行为如果偏离了企业运行的最优绩效，就需要考虑调整约束条件，完善企业制度。

现代企业制度的形成和发展是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过程，由于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就有可能出现经营权侵犯所有权的现象，所以需要一套委托代理制度，明确界

定和规范出资者、决策者(董事会)和经营者三者的权利、责任、利益,对三者关系加以制衡,从而保证经理人员的经营活动不受干扰,同时又对他有所制约和激励。

在市场经济国家,企业的经营者不一定拥有企业的股份,经理的行为受两方面的约束:一是董事会,经理受聘于董事会,你干得不好董事会可随时解聘你;二是广大小股东“用脚投票”,企业经营业绩不佳,小股东抛售股票,企业可能被收购或迫使董事会更换经理人员。这两方面约束的前提,一是要有一支职业化的经理人员队伍,有一个竞争性的经理人员市场;二是要有一个健全的竞争性的股票市场。

一般来说,作为职业化的企业家,其激励主要来自社会地位、声誉和高工资。经理人员经营不善而被解职,他的声誉和社会地位也随之受到影响。

由于各国的市场经济模式不同,公司治理结构也不同,对经理人员的制约与激励的方式和程度也不同,即便是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出资者、决策者和经营者三方的目标和利益冲突也是经常发生的,其公司治理结构也在不断地调整和完善。

建立现代企业的制衡机制

转轨时期的一系列矛盾阻滞了这一套制衡机制的形成。

首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

企业绩效的评价和对经理人员的约束与激励是通过充分竞争的市场机制来完成的,这是现代企业制度正常运行的核心。而在转轨期的现实是,企业已拥有了相当的经营自主权,而市场发育,特别是要素市场的发育严重滞后。我们国有企业的厂长经理是作为党的干部由上级单位的组织人事部门委派,对经理人员的考察评价是组织部门的工作。现代公司治理结构对经理人员的制约,最重要的是经理人员市场的竞争,通过充分竞争的经理人员市场形成对经理人员人力资本价值的升降。公有企业经理人员“跳槽”,社会舆论可以谴责其见利忘义,但从经济学角度看这是理性人的理性行为。公司治理结构对经理人员制约的另一个重要条件是健全的、充分竞争的股票市场。我国当前虽然已经有了股票市场,但是既不健全,竞争也不充分。特别是国有股不允许上市,股市的涨落与企业的业绩相关性极小,对于国家控股的公司来说,小股东的“用脚投票”毫无意义。

在企业自主经营,而市场发育滞后、竞争条件不充分的情况下,企业中由“内部人控制”、“代理人危机”产生的一系列行为,都可以看作理性行为。解决问题的当务之急,不在于对“代理人”的道德批判和严明法纪(尽管这是十分必要的),而在于健全要素市场,完善市场机制,为国有企业创造公平竞争的条件,使经理人员的行为受到

充分竞争的商品市场、资本市场和经理市场的约束,只有在这种市场机制的约束下,经理人员才可能产生符合预期目标的理性行为。

当前的公有企业中，公有权主体的目标与经营代理人目标之间存在严重冲突，用常规的制衡机制已难以协调。由“内部人控制”和“代理人危机”产生的自发的私有化和国有资产的流失难以控制，而规范的现代企业制度和完善的市场机制的建立是要有一个过程的，于是，在我国一部分新兴工业地区的公有制企业和公有产权控股的企业中，进行了一种新的企业制度改革，即企业资产所有权主体结构的变革。变革的主要对象是近十余年新建的国有企业，其主要特点不是在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或者说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调节权限，而是改变企业资产的所有权结构。在新的所有权主体结构中，给经营者以重要地位。即通过部分公有产权的转让而使企业经营者和职工拥有部分股权，以期通过所有权约束而强化对经营者和职工行为的约束。

这是一项颇有争议的改革，经营者持股与现代企业制度要求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相左。同时这种公有产权的流动有私有化之嫌。这种变革是基于以下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是在产权市场和经营者市场尚不健全的条件下，为了稳定企业的生产经营，必须稳定住现有的经营者，二是为了减少由于承包经营

制所形成的既得利益的“阻力”，使产权制度改革得以顺利推进，不得不向既得利益者支付的一定“租金”（参见《改革》杂志 1995 年第 6 期 41 页）。

作为一种过渡性的制度安排，对于制止自发的私有化和国有资产流失以及提高企业绩效是有效的。但是这种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合一，是一种与小规模生产相适应的企业产权安排，并不符合生产社会化的发展趋势，不利于企业规模的扩大，也不利于经营者阶层的职业化和经理市场的形成。

(摘自《东方》)

我国将实行

养老金社会化发放

劳动部提出,我国要加快养老保险社会化管理服务的步伐。到本世纪末,全国范围内要基本实行养老保险基金的全额征缴和养老金的社会化发放。

实行养老金社会化发放,就是将养老保险基金的差额缴拨改变为全额缴拨,把企业发养老金改为由社会保险机构直接发放或用委托银行、通过邮局、依托社区等形式发放养老金。实行养老金社会化发放,是当前深化养老保险制度的重要内容,是转移企业经营机制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客观要求,也是企业和广大离退休人员的强烈要求。

(摘自《农民日报》，黄俊华文)

外汇储备猛增的反思

国际收支天花板

外汇短缺，是发展中国家经济起飞初期的最大制约，几乎没有一个国家不曾为缺乏“硬通货”而苦恼。战后全世界大闹“美元荒”，美元成为与黄金一样的“宝贝”。整个50年代，日本经济在高速增长初期，数次因为贸易逆差和外汇短缺，而被迫收缩经济。苦恼的日本人称之为“国际收支天花板”，形容外汇短缺好像是矮小房屋的天花板，使人抬不起头来。

中国在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时，出口是97.5亿美元，进口是109亿美元，外贸逆差11亿美元，外汇储备只有15亿美元。人们视美元为宝物，外交出国人员人人羡慕，外汇商店是少数人才能问津的“特权场所”。新中国成立以来，直到80年代末期，中国的外汇长期短缺，为了“出口创汇”，几乎动员了一切资源。不论国内资源如何匮乏，只要能够出口，无论亏损与否，均要挤出来出口。为此，国家垄断了全部外贸和部分国内贸易，成立了专门的“出口部”即对外贸易部，全力保证出口。出口创汇计划成为一切计划的核心，只要能够出口创汇，外贸公司亏损多少，全部按照“出

口换汇成本”，给予财政补贴。国家集中使用少得可怜的外汇，进口由各个行政主管部门层层审批。一个企业要使用外汇，必须要提前数月上报计划，通过上级主管部门、经济委员会、计划委员会、外汇管理局审批外汇，再到国家专业银行申请人民币贷款，然后才能按照牌价汇率，到中国银行将外汇买出来。

整个80年代，我国都没有摆脱外汇短缺的困扰。1978年中共中央决心成套引进国外设备，很快就因为外汇短缺而作罢。1980年国家外汇储备竟然出现负数，被迫进行为期3年的经济调整，至1982年，外贸顺差有30亿美元，国家外汇储备70亿美元；1983年外贸顺差8亿美元，国家外汇储备89亿美元；1984年外贸逆差13亿美元，国家外汇储备82亿美元。外汇储备超过外贸顺差的部分，显然是旅游收入和外资流入。

1985年经济高速增长和开放14个沿海城市，使得国家外汇储备在一年之内几乎丧失殆尽。1985年外贸逆差149亿美元，国家外汇储备降低到26亿美元的警戒线以下。中央政府被迫再一次收缩经济，降低开放速度。但是直到1988年，国家外汇储备只能维持在33亿美元。当

年的出口是394亿美元，进口是591亿美元。

1989~1991年3年经济收缩，我国的出口达到719亿美元，进口634亿美元，外贸顺差82亿美元，加上大量外资进入，国家外汇储备达到217亿美元。经过1992年经济高速增长，1993年出现120亿美元外贸逆差，再一次进行经济收缩，国家外汇储备为150亿美元左右。

从150亿到1600亿

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前16年，虽然通过财政补贴、银行挂帐、优惠贷款，特别是按照出口换汇成本水平决定汇率，将人民币汇率水平从1:1.7贬值到8.7，将出口水平从年100亿美元，扩大到1993年的917亿美元、1994年的1200亿美元、1995年的接近1500亿美元，使我国出口占世界总出口的名次，从1978年的第32位，将提高到1997年的第10位。但是由于经济高速增长，消费超前，进口增加，所以到90年代初，始终没有摆脱国家外汇储备短缺对经济增长的制约，以汇率贬值促进出口增长的战略亦始终无法放弃。

但是1994年汇率并轨，取消外汇，将双重汇率改为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我国的外汇储备却出现了大幅度的惊人增长。1994年国家外汇储备超过300亿美元，1995年超过500亿美元，1996年7月达到908亿美元，到年底可能达到1000

亿美元。如果加上1997年7月以后香港的600亿美元，国家外汇储备在短短的4年之内，竟猛增10倍，超过1600亿美元，大大超乎人们的预料之外。难怪四周一片“中国威胁，中国奇迹”的惊呼之声了。

剔除香港的外汇不算，1000亿美元，算不算多？有人说，中国这么大，外汇越多越好；有人说，不多不少刚刚好；也有人从经济效率观点出发，认为国家外汇储备已经是过多了。最后一种看法的依据是我们不是古典重商主义者，更不是向地下埋黄金的“土地主”，外汇不可能放在国内，而是要放在海外生息保值、套利套汇的。以国家外汇管理部门经营这样大的财富，经营效果难以保证。在国家外汇储备大量增加，占用大量国民财富的同时，使用大量国外资金，外债达到了1000亿美元，同时国内资金大量外流。在一个国家的国际收支平衡表上，收入与支出的总和只能是零，贸易项目和资本项目，只能有一个是顺差，如果出现“双顺差”，那么在平衡项目上必然要出现外汇的储备大增，而同时，又要把外汇储备存放国外，这就是资本外流，正如中国大陆近几年出现的现象一样。在国内利润率和利息率均高于国际水平的高速增长时期，资金不能在国内建设发挥作用，反而大量存放海外，经济效益是不佳的。如果再出现海外经营外汇的失控，问题就将严重起来。

外汇泡沫：潜在的经济不稳定

外汇储备猛增，既说明国力的强大，又表示政府调节经济的能力增加，比起外汇短缺，毕竟不可同日而语。国家外汇储备猛增所掩盖的新矛盾，是一种“富贵病”，应有所警惕。

我国经济的发展，已经进入“标准工业化时期”。中央政府承担主要改革成本，使得改革初期的经济无可逆转地走向市场化和国际化，各个利益主体的形成，彻底改变了计划经济缺乏动力的弊病；对外开放度已经达到45%，国际市场的波动越来越大地影响国内经济的稳定；国内消费结构从吃到穿再向住行的转换，将创造出至少2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在经济政策社会基本稳定的前提下，我国持续20年的高速度、高利率、高利润率、高通货膨胀率，完全是经济规律所决定的。

“四高”必然造成的“第五高”，就是高汇率。就是说，外资大量进入，掩盖贸易逆差，造成持续的国际收支顺差，迫使汇率升值，打击出口。国家有两个可能的选择，一个是加速企业和外贸体制改革，帮助企业吸收货币升值的压力，第二个是干预外汇市场，发放本币收购外汇，维持基本稳定。很明显，政策重点应该放在第一点。但由于中国在改革方面滞后，不得不更加依靠后者。数年来，维持汇率稳定，发放人民币收购外汇，外汇储备增

加过快，影响了国内控制通货膨胀的方针。为此，政府不得不采取“对冲”方针，发放国债，减少银行对国内企业贷款，以吸收过多的本币。由于国际收支大量顺差产生的外汇储备和本币同时猛增，游资充斥社会，是造成“泡沫经济”的经济根源。

国内高利率、高汇率造成了一种“套利加套汇”的谋取巨额利润机会：外资进入中国大陆，取得较高的利润率，然后在人民币没有贬值以前，将利润兑换成外汇汇出。即使足外商直接投资，只要不是长期投资，仍然可以享受到这种“特殊利润”。这就产生另外一种“外汇泡沫”，外资对于利润的预期越高，进入越多，进入越多，就越压迫人民币升值。外汇管制和控制国内经济，只能缓解而不能根除这种趋势。政府所能控制的，只能是适当控制货币升值，防止通货膨胀和汇率贬值的预期，防止游资冲击外汇市场。

（摘自《华声月报》）

██

中国又找到 五个大天然气带

“八五”期间，中国成功运用新的理论和技术，找到了鄂尔多斯盆地、四川盆地、陕甘宁盆地、莺歌海盆地等五个大的天然气带，探明天然气储量达6000亿立方米。

（摘自《人民日报海外版》）

██

中国 离开 人口 承载 极限 还有 多少 年?

——饥饿
会重新叩
开中国的
大门吗?



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莱斯特·布朗1994年底在《世界观察》杂志上发表的一篇题为《谁将养活中国?》的文章,对我国的粮食增产潜力以及未来粮食供求趋势得出了一个非常悲观的结论:到2030年,中国将不能养活自己。针对这种近乎耸人听闻的悲观论调;中国政府领导人和一大批学者专家都对此予以反驳,认为我国存在着较大的粮食增产潜力,经过努力完全可以养活自己。但同时他们也认识到这些增产潜力的开发难度很大,未来我国粮食增产面临着几个严重的挑战,人口增长是其中之一。改革出版社出版的《饥饿会重新叩响中国的大门吗》(李希光、聂晓阳著)一书,

对此作了分析,现摘录如下。

人口增长是推动我国粮食需求增长的最基本的和最重要的因素。据测算,即使严格控制人口增长,到2000年,我国人口仍将达到13亿,到2010年达到14亿。如果假定人均消费粮食量不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而增加,仅人口增长一项,就使我国的粮食需求量到2000年绝对增加350多亿公斤,到2010年将绝对增加近800亿公斤。到2030年我国总人口达到最大值的转折点以前,人口压力都将一直是影响我国粮食供求关系的重要因素。

值得提及的是,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1953年)数据表明,1949年我国人口数不是“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人民大众”,而是5.4亿人。1954年公布普查结果时,总人口已接近6亿。

这立即引起中国少数知识精英的极大忧虑,他们力排众议,向国家最高决策者提出严格控制人口的重大建议。马寅初先生疾呼:“中国人口如继续这样无限制发展下去,就一定要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障碍”;孙本文先生更明确地提出应使中国总人口控制在8亿人适度规模的人口目标。

如果说“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在经济上所造成的损失可以用几年或几十年的时间弥补回来,那么人口政策的重大失误对于整个民族的灾难性恶果至少在整个21世纪内都无法消除。作为世界人口最多

的大国，任何人口政策的失误所带来的后果都将是深远的，其代价也是巨大的。

建国以来，我国人口迅速增长，目前全国总人口已突破12亿，占世界总人口的21.4%。由于建国初期人口政策的失误，在1950—1957年和1962年—1973年间出现了两次人口增长高峰，人口自然增长率达到20%以上。70年代后，实行了计划生育政策，人口增长率逐年下降，目前人口增长率已降至11.5%，但由于人口基数大，每年仍净增1300多万人，按照每人每年消耗粮食350公斤标准，每年全国净增人口需要耗费的粮食达450万吨。以此速度推算，10年后遇到的粮食压力会更大。

人口持续增长给粮食总需求造成巨大的压力。对粮食的未来需求也来自于人口增长，仅粮食生活消费需求，2000年就达到34815万吨，其中由于新增人口所引起的需求量占需求增量的40%。2000年各类食品消费需求也将大幅度增长，其中猪肉、牛羊肉、家禽、食用油和酒都将比1985年增长1倍以上，鸡蛋增长0.8倍。

根据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估测，我国现有耕地20.89亿亩，林地17.3亿亩，天然草场43亿亩，水域4.3亿亩，河川径流量2.7亿立方米，地下水约8300亿立方米，资源绝对量虽居世界前列，但人均占有量少，耕地仅2亩，林地1.7

亩，草地4.1亩，水资源2600立方米，均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目前的中国农业在全球7%的耕地上养活了世界人口的22%。中国的播种面积只有美国的70%，但必须供养比美国多三四倍的人口。

建国以来，我国粮食产量从1000多亿公斤增加到1994年的4500亿公斤左右。但人口也从4.5亿猛增至12亿，从而导致人均粮食占有水平增长缓慢，直到70年代初期才恢复到清朝后期的水平。1984年人均粮食虽然达到了创记录的人均400公斤，但随即又进入了徘徊不前阶段，1995年，全国人均粮食占有水平降至375公斤。

1991年，中国科学院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关于《中国土地资源生产力及人口承载研究》报告认为：“我国人口承载量最高应控制在16亿左右，绝不能超过17亿。”

全国人大环境委员会主任曲格平和国家环保局顾问、环境经济学家李金昌教授于1992年初合著的《中国人口与环境》一书指出：“按照中国的国情，中国的最适人口数量为7亿左右，最大(极限)人口数量为16亿左右，超过这个数量，就会发生全面崩溃。”

中国人口承载量最高为16亿或17亿。权威机构和知名人士的认识比较接近，就是说，16亿或17亿是中国的一条“生命线”。如今，我们距离这条生命线只有4—5亿，时间只有20—30年，形势非常严峻。

1996年6月初,李光耀在接受《亚洲华尔街日报》的访问时指出,今后20年内,影响亚洲的最主要因素是中美关系。如果两国关系良好,整个区域将会蓬勃发展,酝酿了50年的经济力量,将以快速度起飞。但是,如果两国关系恶化,它将影响整个亚洲,甚至全世界。

中美关系好转或恶化
美总统选举后会明朗

在回答访员关于中美关系是否会好转或者恶化时,李资政认为这将在美国总统选举过后明朗化,因为美国的态度不可能在这个时刻有所改变。

李资政认为,假如从现在起到美国总统选举期间,没有新的事态发展使中国问题成为美总统的竞选课题,他相信美国有可能在立场上来个基本转变。

而两国关系可能在没有遭受重大挫折的情况下,达至突破点。其中一方或另一方,又或者双方,将会坐下来以友善、诚恳的态度举行会谈。

他说,他在1996年5月,在美国威塞斯堡举行的商业理事会会议上会见了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博士。基辛格告诉李资政和一些美国公司总裁,中国人相当能接受事件恶化所带来的后果。在14个中国将领和他会谈后,基辛格的印象是,

今后 二十 年的 中美 关系 及其 影响

冷战时期在面对苏联的威胁时中国需要美国,然而,现在他们则对美国说:“谢谢,中国现在可以照顾自己。”

中美关系如果糟透
亚洲会分为三个阵营

在回答访员询问有关中美关系继续恶化,或变得更糟,或有所改善,公元2016年的亚洲和现在的亚洲将会有哪些显著的不同,李资政做了这么一个假设。他说,如果两国关系糟透,他认为亚洲会分为三个阵营,

一个阵营是那些与美国公开认同的如台湾和日本,纵使日本会不愿意被牵涉在内。

二是那些宁可介于两者之间,然后再根据课选选择它们要投靠哪一方的国家。这个阵营将包括大部分的亚细亚国家。

三是公开靠在中国一边的少数国家。

对于亚细亚国家来说,中国的蓬勃发展,是加速亚细亚成员国发展的另一动力。

如果中美保持良好关系,亚洲将得以蓬勃发展。李资政形容这将是“非同小可的成长”,这股酝酿了50年的经济力量,将快速起飞。

20年里将以怎样速度成长?

在谈到在他预见的20年里,整

个区域将以怎样的速度成长时，李资政说，取得最高经济成长的将是那些在各个领域还须跟上的国家，先是中国，然后是越南，再下来是缅甸，因为它们只需要基础设施和一些技能。它们有的是许多有待开发的劳动力、土地以及其他资源，它们将急速向前冲刺。跟在它们后头的是新生经济体，如马来西亚、泰国，甚至印尼，如果苏哈托总统已为未来接班人作好安排。

成长最缓慢的将是日本，因为它已是个成熟的经济体。但是，无论日本的经济成长有多缓慢，它还是比西欧和美洲高出一个百分点。到公元2000年的最新经济预测显示，西欧和美洲的经济成长是2.5%，而日本的经济成长则介于3.5%和4%。

最理想的是中美达成
平稳的相互合作关系

李资政认为，对亚洲来说，最理想的方案是中美之间达致平稳以及相互合作的关系。这将使美国继续留驻本地，参与经济改革从中获益，并且影响在过程中出现的课题，包括中国的发展方向以及整个区域的发展方向。

他进一步说，这种关系就是美国当初邀请中国加入亚太经济合作论坛时所期望看到的，当时美国的敌对国苏联还没解体。李资政说，他还记得曾与当时的美国总统布什、国务卿贝克以及国防部长切尼

交谈，他们都希望在本区域建立起把中国包括在内、却又把苏联排除在外的关系，他们都愿意协助建设中国。他说，就是这种观念，使中国得以把香港和台湾在大陆制造的产品大量输往美国。

李资政认为，若这种看法得以延续，而中国又在尊重知识产权的情况下向美国购买电脑软件、汽车、飞机等，中美之间的合作关系将使亚太区蓬勃起来。

不认为中美会爆发战争

情形最糟的是对抗性方案。至于两国是否会爆发战争，李资政的看法是否定的。他说“我们说的是两个核子强国，不是伊朗、伊拉克或者利比亚……。美国和中国必须接受彼此的存在。”但他却否定小国之间爆发战争的可能性。他说，如果局势紧张，可能会导致纳不同立场的国家发生摩擦。

他预见在这种情况下，每一个课题的出现都会促使亚细亚成员国之间持有迥然不同的看法。

而新加坡地处南端，可以不带偏见。资政说：“事实上，新加坡不希望被看作永远支持任何一方。任何一个亚细亚国家也不会这么做。”

（摘自新加坡《联合早报》）

